

100
CMB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美] 福梅龄 著
闫海英 蒋育红 译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
(1914~1951)

Mary E. Ferguson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
(1914~1951)

[美] 福梅龄 著
闫海英 蒋育红 译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 (美) 福梅龄 (Ferguson, M. E.) 著; 闫海英, 蒋育红译. —北京: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2014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ISBN 978-7-5679-0149-0

I. ①美… II. ①福… ②闫… ③蒋… III. ①医学-基金会-介绍-美国 ②北京协和医学院-介绍 IV. ①D771.27 ②R19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71824 号

Translated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of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 (1914~1951) By Mary E. Ferguson,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 Inc. New York, 1970.

© 1970 China Medical Board.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根据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与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 (China Medical Board, CMB) 之间达成的协议翻译出版。

出版外国图书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3-1558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编 著: [美] 福梅龄
主 译: 闫海英 蒋育红
责任编辑: 顾良军

出版发行: 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
(北京东单三条九号 邮编 100730 电话 65260378)

网 址: www.pumc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北京佳艺恒彩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1000 1/16 开
印 张: 16.75
字 数: 240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2000
定 价: 38.00 元

ISBN 978-7-5679-0149-0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及其他质量问题,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協醫西校刊

胡適題

协和学生年鉴《The Unison》（1931~1932）的扉页。

胡适题辞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译丛

前 言

在过去的一百年中，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取得了巨大进步，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延长了将近一倍，过去经常发生的灾难性的疾病也得到了良好控制。中国之所以取得如此巨大的进步应得益于现代医学科学的进步及医学教育的发展，中国的科学家及有关机构也在这百年中逐步成长起来。在此科学道路上孜孜以求的最杰出代表即是有名的北京协和医学院。了解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早期历史以及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努力会帮助我们认识过去，也将有益于我们探讨中国在医疗卫生方面的未来发展。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1914年成立，到2014年，即有百年历史。从利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金建立北京协和医学院至今，CMB见证了中国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与中国一起经历了极其辉煌的医疗卫生史。值此庆祝一百周年之际，CMB组织翻译了四部经典英文著作，回顾了北京协和医学院和CMB合作的历史，以飨中国读者。这一套丛书通过对历史人物、机构及活动的描写，阐述了中国在发展现代医学过程中的成就及其相关的争论。其中有三本书集中描述了北京协和医学院，第四本书则重点讲述了洛克菲勒家族在医疗慈善事业中的开拓作用。

为了向中国读者呈现这段历史，CMB访问了很多北京协和医学院及其他机构的领导者。最终，CMB的顾问委员会决定由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三本著作，另外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在此，我们要特别感谢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和达尔文·斯泰普尔顿等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为书辛苦作序，向中国读者推荐这四本专著。感谢刘

2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德培教授专门为丛书题字。

还要感谢参与翻译丛书的特别顾问达尔文·斯泰普尔顿、梁其姿、刘德培、袁明、张大庆、张力军、张霞、蒋育红；译者韩邦凯、魏柯玲、闫海英及参加翻译工作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师生等；CMB的工作人员张烨、李曼玉、阮志贞等。

董事会主席 玛丽·布洛克

Mary Brown Bullock

主席 陈致和

Laurinda C. Chen

2013年7月11日

致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百年华诞

任何人想要研究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北京协和医学院（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UMC）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历史或 20 世纪中国医学史，必然会把福梅龄（Mary E. Ferguson）所著的《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书列入必看的参考书。¹福梅龄本人亲历这三家机构，对它们有着深入的了解。她遍览书面资料，一一访谈亲历者，遂成就此书。这部著作既是一本历史书，也是一部个人回忆录。

福梅龄（1897~1989）出生在南京。她的父亲——福开森（John C. Ferguson）是一名卫斯理传教士，由其创办的一所机构即为今日南京大学的前身之一。福梅龄先是在中国接受教育，后赴美国完成高等教育。1914 年~1916 年，她在维斯理学院（Wellesley College）学习两年；1916 年~1918 年，她在拉德克利夫学院（Radcliffe College）求学，但未获学位。1919 年，她返回中国。当时，父亲正在积极开办报业，并担任国民政府教育事务顾问。1928 年，她被北京协和医学院聘为注册部主任。1932 年，她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校董事会秘书。在这一职位上，她一直做到 1951 年。²一位与她本人相识的历史学家评论道：“福梅龄中文流利，具有很强的语言功底；她的睿智更让她成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核心人物。”

20 世纪 60 年代，CMB 想出版一部著作，作为其在中国 35 年历史的核心记录。显然，福梅龄是撰写这部著作的最佳人选。她曾经是北京协和医学院大部分历史的正式记录员，她本人认识许多这段历史中的重要人物，而且还是一名虔心学习中国史的学生。她非常明白三家机构之间错综复杂且常常极为棘手的关系。洛克菲勒基金会于 1914 年创建 CMB；

2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CMB 构思并创建了北京协和医学院（1917 年至今）；在 1951 年之前，北京协和医学院本身的管理和运转都依赖于 CMB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提供的财务支持和许多其他资助。福梅龄在本书中的核心任务之一，就是梳理这三家机构之间的关系。为了这一目的，也是为了记述这段历史的全貌，她以三家机构大量的档案记录为基础，成就此书；这些档案记录是美国现存的有关中国现代史最丰富的资料之一。⁴

在阅读本书时，你可能会立即质疑其观点。此书写于东西方冷战的高峰期。在当时的美国，中华人民共和国通常被称作“红色中国”。许多人都认为中国是越共的资助者。那时，美国军队与越南军队在越南激战正酣。然而，福斯迪克在前言中已定下福梅龄在书中的基调，即“现代医学是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的一条纽带，它跨越了意识形态和领土边界”。⁵这颇有先见之明。仅仅五年后，就有位医生到中国旅行，他就是洛克菲勒基金会的会长——诺尔士（John Knowles）。⁶

因而福梅龄基本上没有卷入国际政治气氛，这可谓幸事。然而，在关键的地方，她的确谈到了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发展；以此为背景，她讲述了 CMB 的历史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历史，也稍稍提到了美国历史。她直言不讳地描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的内乱；此外，中国与日本之间日益加深的冲突，导致 1937 年战争全面爆发。她特别提到，中国政府常常要求北京协和医学院在危机时候提供医学援助和专业人员，而北京协和医学院也由此受到了影响。

在撰写本书的过程中，显然，福梅龄受到了自身情感和经历的影响：到 1954 年，虽然她已经在美国呆了近 12 年时间，她还是把中国描述为“我工作、家人和朋友”所在的地方。后来，她把自己在协和的日子称作人生中最有意义的岁月，因为她“接触到了（中国）最有才干的男性和女性”。⁸本书的读者会发现，在书中，她一直很同情中国和中国人民，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比如，福梅龄提到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中国政府对西方资助的教育机构提出的要求越来越严厉，政府对精英教育机构有着普遍的期望。实际上，这些期望让纽约的 CMB 办公室感到惊恐

万分。

CMB、洛克菲勒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三家机构之间的关系很复杂。每家机构都有自己的管理层、董事会，而财务是其中最为关切的事。福梅龄一直将此看作是“纠缠不清的”、甚至是“可悲的”。几乎从北京协和医学院建校伊始，她就认为“很难区分谁是最终的权威决策者”。各种各样的情况——从宗教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作用，到影响学校的重大决策责任，常常引起“紧张和压力”。其中，当中国的协和校董事会受挫于纽约的举措时，董事们普遍感到“愤怒”。¹⁰

按照福梅龄的观点，把协和尽快变成一个纯粹的中国机构的承诺也只是部分得到了兑现。洛克菲勒组织和洛克菲勒家族没能放权，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本书中间部分，她用大量篇幅详细讲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协和校董事会和CMB之间存在的误解和冲突。那时，中国人在协和校董事会中占三分之二，这个比例是很大的；而纽约的CMB和洛克菲勒基金会之间联系紧密，尽管它已于1928年在法律上成为一家独立的法人机构。¹¹她还意识到，洛克菲勒二世通过他的儿子——洛克菲勒三世，一直在直接施加影响。洛克菲勒三世于1930年被任命为CMB的秘书。¹²考虑到洛氏家族三代人对洛克菲勒基金会、CMB和北京协和医学院的个人兴趣，福梅龄本人是把洛克菲勒家族的影响看作是搅和或仅是不可避免的介入，便不得而知了。¹³

最终，福梅龄写此书的主要兴趣点就是要明确：到1951年前，不管困扰学校的内在和外在问题，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核心目标已经基本达到。她认为学校的“科学目标……从未修改或改变过”，因而非常有激情地写到学生们的素质和奉献精神。¹⁴她自豪地提到，协和的毕业生在中国其他机构中的影响越来越大，尽管协和本身拥有的中国教职员队伍建设得很缓慢，中国人掌握学校的行政管理权进展得也很缓慢，但却在稳步地提升。¹⁵协和在被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归国有后不久，洛克菲勒二世写了一封信。在本书结尾部分，恰当地引入该信的一段内容：“我们不能认为，这就必然意味着协和的作用会减弱；事实上，这只不过是管理上发

生了变化。”福梅龄将这一段挑选出来，再次强调她在书中的立场，即如何在接受政治现实和对学校成就的赏识之间，寻求最佳的平衡。

达尔文·斯泰普尔顿 (Darwin H. Stapleton)

2013年5月

参 考 文 献

1. Mary Brown Bullock refers to Ferguson's volume as "an authoritative account" in her own volume, a thoughtful and nuanced study that evaluates "the appropriateness of the PUMC model" for China: Mary Brown Bullock, *An American Transplant: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Berkeley,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0), p. xviii.
2. Mary E.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A Chronicle of Fruitful Collaboration, 1914~1951* (New York: China Medical Board of New York, Inc., 1970), pp. 74, 188, 232; Barbara Schultz and Rachael Cristine Woody, "A Finding Aid to the John Calvin Ferguson Family papers at the Freer Gallery of Art and Arthur M. Sackler Gallery Archives," www.asia.si.edu/archives/finding_aids/ferguson.html, accessed April 23, 2013; John Z. Bowers,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1917~1951* (New York: 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 1972), pp. 86-87.
3. Mary E. Ferguson, "Wellesley Alumni Questionnaire," c. 1968, Wellesley College Archives, Wellesley, Massachusetts, USA, copy courtesy of Ian Graham, Wellesley College Archives; Bowers, *Western Medicine in a Chinese Palace*, p. 86.
4. At the time of Ferguson's research, the archives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the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the Rockefeller family were in separate locations in New York City; beginning in 1975 they were consolidated in the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Sleepy Hollow, New York, USA (www.rockarch.org).
5.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 5. Raymond B. Fosdick was president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36~1948, and previously had been both a trustee of the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a member of the Board's executive committee.
6. John Knowles, *China Diary*. Working Papers of the Rockefeller Foundation (New York:

- Rockefeller Foundation, 1976)
7.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56–57, p. 71–72, 129. PUMC expertise was utilized by the government of China as early as 1920; Paul C. Hodges to L. C. Goodrich, 11 September 1922, attached to L. C. Goodrich to R. S. Greene, 13 September 1922, folder 968, box 134, China Medical Board Inc. Archives, Rockefeller Archive Center, Sleepy Hollow, New York, USA.
 8. Ferguson, “Wellesley Alumni Questionnaire,” appended notes for 1954 and 1978.
 9.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p. 61–64, 69, 127–28.
 10. Ibid., pp. 23, 40–41, 47–48, 69, 82, 102–115, 134, 145, 151, 194.
 11. Ibid., pp. 68, 73, 102–115.
 12. John D. Rockefeller 3rd had a strong interest in China and East Asia the rest of his life. See John E. Harr and Peter J. Johnson, *The Rockefeller Conscience: An American Family in Public and Private*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91).
 13. 最近, 玛丽-布朗·布洛克认为, 在 20 世纪 30 年代, 洛克菲勒二世和洛克菲勒三世“仍认为协和是归洛克菲勒所有”。见: Mary Brown Bullock, *The Oil Prince's Legacy: Rockefeller Philanthropy in China* (Washington, D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and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90.
 14. Ferguson, *China Medical Board and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p. 44.
 15. Ibid., pp. 57, 127, 154, 202.

序

《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一书以简洁、明快而又动人的文字，把我的记忆带回所亲历的一项伟大事业以及其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这项事业不得不归于终结，令人无比遗憾！尽管如此，我仍然相信，这项事业从未失败。

在创办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过程中，我们展现了超凡脱俗的远见卓识。现代医学的概念引进中国后，对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意识形态上的冲突——吉本（Gibbon）称之为“由神学上的憎恶而导致的极度仇恨”——并未延伸到医学领域。因为健康是全人类所共同渴望的，各个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为争取无尽的医疗服务而竞争的场面。现代医学超越了意识形态和领土疆界，是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的纽带。现代医学是人类团结起来的集结点，是全人类社会最终实现和谐的基石。

这是一部令人振奋的著作，它讲述了人类反抗命运、思想超越时代的故事。

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

自序

本书按年代顺序，记述了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hina Medical Board, CMB）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建北京协和医学院（PUMC，或“协和”）的过程及其之后三十七年的发展历程。了解了这段历史，我们就会明白为何协和能够取得如此卓越非凡的成绩，对中国和整个东亚的医学教育与实践产生了如此深远的影响。作为我，一个深入参与北京协和医学院二十多年管理的人，对协和有着特殊的感情。对于其他的史学家来说，评估协和的成就也是很有意义的一个课题。

能够有此殊荣来撰写这份历史记录，我衷心感谢位于纽约的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CMB）及其管理人员，他们是：主席约瑟夫·黑塞（Joseph C. Hinsey），主任、现任会长奥利弗·麦考伊（Oliver R. McCoy），现任主任帕特里克·昂格雷（Patrick A. Ongley），秘书皮尔斯（Agnes M. Pearce）。当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停滞不前时，他们或单独，或几个人一起，给我鼓励和帮助；他们对本书的兴趣和耐心，最终促成了本书的问世。

尽管尚不可能在北京协和医学院的档案中查阅到重要的记录，但我还是很容易地得到了大量文件资料。作为协和在纽约的办事处，CMB一直都和协和的管理层保持书信往来，也经常代表自身在很多事务中发挥作用，并且保留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其中包括在北京的校董理事会和其他行政管理部门的会议记录。这些文档资料完好无损地由CMB保存着，并构成了贯穿本书众多细节的主体框架。我最初着手这一工作时，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热情介绍我到洛克菲勒基金会档案室查阅，给我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他帮助我确认各个事件过程和日期，特别是早期发生的事情。事实上，在建校之初洛

2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和北京协和医学院

克菲勒基金会、CMB 和北京协和医学院彼此关联，这三家机构的记录都在一起，当然把它们分开也没有多大的意义。洛克菲勒基金会的继任者也允许我继续查阅这些档案资料。对那些为我查阅资料提供帮助的工作人员，我深表感谢。顾临夫人很慷慨，把她丈夫这些年来与 CMB 和协和有关的私人文件也都交托于我。现在，这些极为宝贵的资料和顾临其他的私人文件都被保存在哈佛大学胡恒德（Houghton）图书馆。

此外我也有幸与许多曾经在协和工作的人直接交谈。由于版面关系，不能一一列出所有谈话和书信往来的人员名字。他们的回忆丰富了协和的历史发展过程，也帮助我标注了历史照片。对此，我对各位献上最诚挚的感谢。

在所有这些人中，对澄清历史记录发挥了巨大作用的人物都是协和历史上的关键人物：已故的首任校长麦可林（Franklin C. McLean）；其继任者胡恒德（Henry S. Houghton），他还在珍珠港事件前几年二次上任，担任校长一职；护士学校首任校长沃安娜（Anna Dryden Wolf）；1930 年~1940 年间任职的护校校长胡智敏（Gertrude E. Hodgman）；医学预科学校建立伊始化学系的负责人、后升为主任的威尔森（Stanley D. Wilson）；1936 年~1948 年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会长的福斯迪克（Raymond B. Fosdick），他参与了很多影响协和的重大决定。如果没有他们心甘情愿地跟进成书过程，阅读草稿，解读他们参与的事件，补充个人亲身经历，并持续给予我鼓励，本书可能永远不会完成。

按照 CMB 最初的设想，我本来想与刚刚从 CMB 主任职务退休的娄克斯（Harold H. Loucks）合作撰写这份历史记录。娄克斯也是二战前和二战后到协和工作的外科教授。如照此思路，毫无疑问地，本书将更加强调协和在科学和教育上取得的造诣。后来，娄克斯由于身体健康状况长期欠佳，未能参与到本书写作过程中。然而，幸运的是，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还能通过电话和书信直接与他保持亲密的

联系，向他咨询。每版、每页书稿的完成，都凝聚了他的智慧与客观公正的判断。

同时，也非常感谢纽约 CMB 和洛克菲勒基金会的顾问昌西·贝尔纳普（Chauncey Belknap）、哥伦比亚大学中文荣誉教授富路德（L. Carrington Goodrich）和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宣教学荣誉退休教授贝德士（M. Searle Bates）。他们花费宝贵的时间审阅、完善了终稿。

最后，把我无尽的感激送给所有热爱协和的朋友们。正是因为你们，本书才有可取的价值。书中如有错误或欠缺，都是我个人的责任。对我们所有人来说，这是一份源自爱的工作。

福梅龄（Mary E. Ferguson）

纽约

1970年9月1日

目 录

序	1
自序	1
开篇语	1
第1章 缘起（1913年~1916年）	3
第2章 建校（1916年~1921年）	17
第3章 成长（1922年~1936年）	41
第4章 动荡岁月（1937年~1939年）	120
第5章 风云突变（1940年~1941年）	143
第6章 珍珠港事件和战争年月（1941年~1945年）	161
第7章 憧憬（1943年~1946年）	170
第8章 从头再来（1946年~1949年）	185
第9章 适应新政权（1949年~1950年）	192
第10章 旧时代终结（1950年~1951年）	205
尾声	211
附件	213
附件1 北京协和医学院的董事和管理层（1916~1951）	215
附件2 教职员工——医、护、教、行政（1918~1942， 1947~）	217
附件3 毕业生名录——医学院和护理学院	229
附件4 美国中华医学基金会的职责及其与北京协和医学院 校董事会的关系	238
索引	240

开 篇 语

显然，无论西方医学能为中国提供什么，对中国国民来说都没有什么用处。除非有一天，由中国人接管并使其成为国民生活的一部分。因此，我们必须期盼有朝一日，即便不是所有教职员职位都由中国人担任，那么大多数职位……也要由中国人担任；现在，校董事会由学校的创建机构委任的代表和在中国传播西方文明的代表组成，到那一天，将有中国的重要成员在校董事会任职；学校目前的资助，来源于创建机构的拨款，到那一天，除了这项拨款和学费外，学校获得的资助将如同世界上其他国家类似级别的医学院校一样，源于中国人的捐赠和政府的资助。让我们为实现这一目标，为在中华大地上永久地建立起世界上最好的医学科学而携手共进。

洛克菲勒二世 (John D. Rockefeller, Jr.)

在北京协和医学院开业典礼上的讲话

1921年9月19日